

我要说的,不是时下的宁波女性,而是我祖母那代的宁波阿娘。她们在上海产生过空前的影响。她们的出身,以平民居多。一般会晚一拍,抵达自己男人或自己生的男人谋生之地,比如上海,比如南洋东洋。我辈的阿娘们,大多是抗战之前来上海的,速返乡关者绝少。我的祖母,从奉化到上海,用四十年走完一个单程;另一个单程,她已在骨灰盒中了,由11岁的我,顺着她来时的航海线,护送返乡。

宁波阿娘

郭峭峰

她们大多目不识丁,却在参透人生上,普遍具有相当的慧度。她们口音浓重,语句连贯,无所顾忌地使用出生地的词汇,一开口就与书面语遥不搭界了。这倒不影响她们在敷衍、附会、客套、赞许、评判、讲价、圆场、辩解、应酬等日常言语应对中,水准不俗。这很可能是因为浙地人口稠密,她们原本的交谈历练就已到相当境界;到上海后,生活空间更加逼仄,再加草根解决百事不喜依赖中介,交际的频率高企,强化了晋阶操练。那把刀子时时在磨,锐利了,也是再自然不过的。

宁波妇女,是极其吃得起苦的一类。那些年头,生活压力大,她们的安全感一律较差,需要从议家长里短中,获得正向暗示。难怪她们常以低看同类,来变相肯定自己。在不断确定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后,她们的安全感才多少获得加固。她们在

搬弄是非上,也多为角色,息事宁人往往不是她们的首选,原因同上。在这方面,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比,宁波女人确实不见得更加通达。

此外,我们阿娘辈的宁波女人,具有清晰的生活目标、艰难度日时的精明、不顾一切的面子感、偏向议论文功底的口才。她们把任何吃亏看得比较严重,对推广家族名声和强调自我正当不遗余力。她们不太好商量地重男轻女,在背后支撑自己的男人通常无怨无悔。不要以为阿娘们只要不失利益就可罢休,她们把义也看作一种利的。所以,失礼失义了,对阿娘们来说同样是要紧的。

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是,这些从婀娜多姿的年轻女子,一步步成为耄耋老妇的宁波女人,很少考虑自己。她们还来不及关注自己对家族的奉献,就已经献出了自己。我的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个儿子,外加两名女儿。有了我这个孙子后,这个家的地位排序,在祖母眼里,我的父亲是老大,本孙子是老二,祖母自己及其他女性一律都不算老几。家庭以男性为中轴,其他均为次要。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天独厚,在宁波人的家族里司空见惯。关键是,最卖力倡导男尊女卑的,并不一定是男人,而是宁波女人自己。是不是传统宁波人潜意识里觉得,家

里人是由男人养活的,家族血脉也主要靠男人繁衍?囿于这个原因,宁波人心中,大概有一种很积极的繁衍和生存优先,对此行为中的主力予以特别保全,男性就此有福了。

“15分钟”留点“书时间”

王妙瑞

如今各区都在着力打造“15分钟生活圈”,呈现在我居住的社区,超市、卖场、邮局、银行、影院、公园、食堂等等都齐全,经过微改造,绿化更美,宜居感更强。从智慧社区的角度来看,今日的生活圈不同于过去的半径500米生活圈,内涵和品质有了新的大变化。

点赞之际,我对书香难进生活圈也有遗憾。这个圈不光要有完善的诸多便民设施,还要有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阅读场所,而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。

比如我小区最近的一个口袋公园只有300米距离,国内也有空房子,作为爱书人,我想如果开辟出一块场地为阅览室该多好。最近小区对面100米处又新建了一个长1公里多的高线公园,社区居民添了一处休闲地。我边走边看,2层的钢结构行道设计新颖,底层有篮球架、儿童秋千等,两头的负地层设置了相同展览框架,占用了很长一段面积,介绍高线公园的来龙去脉等。但其实本社区的人熟悉情况,哪里会天天看这些东西。留一个供来玩的游客了解就够了,反倒不如开辟几个能坐能借阅读书籍的阅读点,让喜欢学习的居民在休闲中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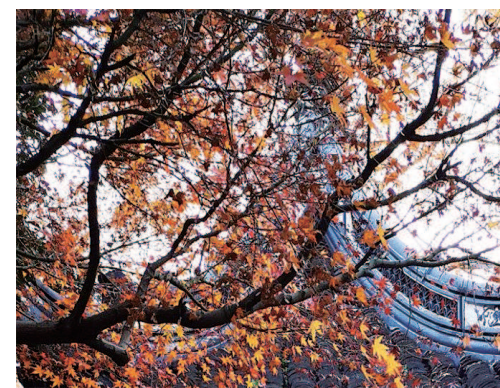
打造“书香上海”,不妨从生活圈做起,我期待闻到这样的馨人芳香。

的年纪。我发现,那种无所保留、不需交换的情感,哪里还容我去理性掂量。那不是思想后的举动,是很本色的血亲冲动。为了我的愉快,祖母可以完全不相称地付出自己。我这一生中,没有第二个人会甘愿如此。我对着墓碑的跪言,她能收到吗?

阿娘曾对我说,永远不要用文字的纸上厕所,不敬,那是不好的。即便掉在马桶圈上的饭粒,也应该吃掉,浪费,那是不好的。

有一件事,是我仍在奉化的表姐告诉我的。抗战前,祖父在日本挣钱,小镇上的祖母,日子是好过的。祖父在横滨莫名失踪后,祖母可以用的手段都用尽了,依然查无下落。从此,东洋定时的汇款就断了,家族中类似阶级的亲戚老友继续还在往来。某个正午,家人说,已经望见某师母拎着大包小包,来做客了,而家里早已拮据不堪。祖母从橱里拿出一件水獭皮的大衣,以一

真正从心头涌起感恩,是我已接近祖母当年



七夕会

薄的围巾,搭配纯棉的衣裙,很随性很典雅。这样的女子,难得见到,让人欣赏。人的喜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变的。现在我崇尚简单,冬天里有一条百搭的围巾最好,色彩上喜欢亮丽的甚于原来暗沉的。有次看电视剧,女主角有一条红围巾,她常穿黑色的呢子长大衣,围在脖子上的那一抹色彩,令她庄重之外显得无限的明媚和柔美。于是第一次发现,颜色很正的红色,无比好看,纯粹,热烈,端庄,高贵。或许到了暮年,我会挑一条纯红色的围巾给自己。想起来就感觉那样美。

最近因为棍包涨价,法国民生稍有不宁。央视财经报道,法棍面包的价格在过去20年里只上涨了0.23欧元,目前平均售价是0.89欧元一根。预计到今年年底,法棍面包的平均价格将突破1欧元大关。涨价幅度似乎不大,但对法国日常生活却影响极大。法国人对面包的认真程度,到了要立法的地步。1919年,法国国会通过“法国面包法案”,规定法国面包只能以水、盐和面粉制造,不能加入任何人工酵母和化学添加剂。1993年修订案更限定,只有“一条龙”生产,以全人手方式发酵、搓面团和烤焗,才有资格称“自制面包”(pain maison)。很多人笑话法国棍包硬邦邦咬不动只能拿来打架,而我却在此间找到了另一种青春乡愁。

法包日常不平常

黄峪

中国人随遇而安,四海为家,但对故乡最为执着的也许是肠胃。客居他乡美食再好,最终还是要去唐人街吃碗粥粉面饭。所以常有人说“I have a Chinese stomach(我有个中国胃)”。但对我来说,安抚肠胃的不仅是粥粉面饭,还有法国面包。这种肠胃的乡愁,应该是在法国留学时候养成的。当年日子还是过得蛮节俭的。虽然拿着国家奖学金,但也不能天天大吃大喝。还记得硕士班上有男同学,天天就是在宿舍打火锅,听起来好像小日子过得很滋润,其实是因为他懒得刷锅洗碗,每天都是同一锅汤底,把肉菜面条等往里一扔就算是一顿。所以他邀请吃饭的时候,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,知道后续节目定然是帮他洗刷。对于我来说,最简单的一顿,就是买一根棍子面包,配上几颗盐水浸橄榄,抹点芝士,吃些水果蔬菜,也就是营养丰富的一顿。如果想放松一下,就给自己倒上一

杯红酒。棍子面包,当年大概也就是0.7欧元左右,盐水橄榄超市里面买的话一瓶也就一两欧元,我最喜欢的山羊奶芝士可能会稍微贵一点,如果要省可以换另外一种抹酱,比如说法式芥末、果酱、黄油等。水果蔬菜那些就更加好吃不贵了。罗讷河谷本来就盛产红酒,一支新酒博若莱(Beaujolais)价格也就是两欧。实在馋吃肉了,那就切一片里昂干肉肠(saucisson sec)配上。年轻人牙好胃好,吃嘛嘛香,这一顿下来,不仅营养均衡,合计可能还比涮火锅还便宜,更妙的是连碗都不用刷。当年最难忘的经历,就是冬夜凌晨四点跑到面包房等开门,买一根当天头炉烤出来的棍子面包,拿在手里热乎乎酥脆,麦香扑鼻。面包师傅还特意提醒我要侧耳倾听煎焦面包皮噼啪作响,因为这是“会唱歌的面包”(le pain qui chant)。的确,面食做得好,俨然是有自己的生命与意志,和饕餮吃客,甚至会相见甚欢。有一间近年在法国颇为成功的连锁中国面店,名字正叫做 Les Pates Vivantes(活着的面条),咬嚼吞咽的不仅是滑溜的面条,还有活蹦乱跳的生命力。

本地有一间很好的连锁法式面包店,名字叫做 Le Pain Quotidien,直译过来,就是“日常面包”的意思。但几间店都开在高档商住地带,装潢欧风格调,价格不算日常。前天去吃了一个招牌早餐,一玻璃杯鲜橙汁、一圆碗咖啡、一篮子四片不同质地的法包加一个羊角包,两种不同的抹酱,加起来价钱折合下来也要十多欧元了。但偷得浮生半日,一边嚼着脆中带韧的法包,一边回味当年穷学生无忧无虑的生活,感恩现在自己牙口胃口还算不错,倒也值得。

滑稽戏和话剧都源自上海的文明戏,是上世纪初同根生的两朵花。滑稽戏主要讲吴语区方言,很难走出长三角;讲普通话的话剧就走向了全国,还几乎变成了北京的特产。在《茶馆》的影响下,《左邻右舍》《小井胡同》《窝头会馆》等写四合院的“京味话剧”佳作迭出;但要想找到能品出正宗上海味道的话剧,无论弄堂、石库门还是花园洋房的故事,都是难而又难。

所以,滑稽戏《上海的声音》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。没想到滑稽戏这个论影响与话剧没法比的“小剧种”,竟拿出了这样一部既对标京味话剧、又挑战上海话剧的实骨硬挺的“上戏”。

上海戏要接地气,一定要发现上海人的独特之处。秀英语的白领在哪个城市的写字楼里都差不多,英雄模范总是放之四海而皆红;而最有特色的上海人往往是弄堂里的“小市民”——这群舞台上久违了的小人物在《上海的声音》里一个个大放异彩。王汝刚演的根发守着一爿小烟酒店,虽只占舞台一角,却是全剧这艘大船的“锚”。在家家户户都缺钞票的年代,根发常常忍痛让邻舍赊账——赊的可不是一天两天;但他也很会斤斤计较,而且脑子煞清。涂阿姨给儿子办喜酒他来送“份子钱”,先把几个月里赊的账一笔一笔理清爽,只要再拿出五分钱就算送了五十元。

剧中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,有的有点生理上的缺陷——如那个智力迟钝但特别可爱的“刚刚”;有的因为职业较“低”不易嫁出去只好“骗”——如那个让男朋友当成是“出海船员”的环卫船上的“船娘”,还有她那为赚钱脱贫而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丈夫“塑料头”。

人民滑稽剧团的这个戏有意识对标的是1958年的经典《七十二家房客》,那是最出名的“上海戏”——名气比高大上的话剧《上海屋檐下》都要更大些,还被移植去了广州、香港。但嘲讽旧社会的各种坏现象可以百无禁忌,而塑造当代上海人应该传播正能量。《上海的声音》迎难而上,人物塑造得很巧妙,那些“小市民”平常日脚毛病多多,私心和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,笑点不断,但到了关键时刻却都是讲义气重情义的“模子”。

当年《七十二家房客》的故事集中在一幢房子的几天之内,而俞志清、徐频莉写的《上海的声音》有四合院京味话剧的格局,要讲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上海故事,时间空间都大大超过《七十二家房客》的容量。照北京喜剧家陈佩斯的“结构喜剧”理论,这样的剧本结构不容易出喜剧效果。但《上海的声音》还是做出来了,因为滑稽戏有很多段子手法可以在正剧的结构中也引爆笑点——有时还同时引爆泪点。

全剧的故事实在长,剧中还有不少潜在的亮点没能充分发光。譬如现在唱段太少,不少情感戏的桥段完全可以加唱,但那样一来就可能要演三四个小时了。如果这部难得的上海戏干脆就分上下集呢?连台本戏本来就是“上海戏”独有的特色。

“教坏”

王懋明

张岱在《夜航船》里记了这样一件事:司马光家里,有一个老仆人,在他家待了三十多年,一直叫司马光“君实秀才”。有一天,苏轼去拜访司马光,听仆人这么叫,觉得不妥当,就纠正他:“不能这么叫,应该称呼‘大参相公’。”老仆人改口后,司马光很惊奇,就问他为什么改口,老仆人如实回答了。司马光感慨道:“好好一个仆人被苏轼教坏了。”

其实,在老仆人眼里,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是布衣还是卿相,司马光就是一个读书人,书生是他的本色。叫他“君实秀才”,叫了几十年,叫的人,听的人,都感觉自然亲切,没有什么不妥。从这件事中,也可看出老仆人本性的纯真和善良。称呼“大参相公”就不同了,“大参”是参政,“相公”是宰相,是了不得的大官,皇帝之下众臣之上,是特有地位身份的人,这一称呼就包含了太多的社会性和功利性,难怪司马光会发出这样的由衷感慨。

有时候,人就是这样被逐渐“教坏”的吧?

冬天里最美的饰物是围巾。它美在色彩。色彩会自己讲述,展现的是与众不同的喜好。我从前只喜欢素色,尤痴迷藏蓝,介于黑色与蓝色之间,既庄重也不沉闷,淡雅也不艳。去商场经过围巾柜台总会仔细看一看,遇见喜欢的忍不住买下围一圈,这当中最多的是蓝色:藏蓝,纯蓝,深蓝,淡蓝。或深或淡,买来买去,皆是这一个色系。曾有一条羊绒淡蓝大方格围巾,既温暖又淡雅,它的淡如云彩,给予我安然妥帖。还记得一条纯深蓝的羊毛围巾,逛商场时被它的色彩吸引,从

时尚

「上海戏」的惊喜突破

孙惠柱

桂林公园一角

傅俊珂摄